朱子学与经学研究的新突破

---·评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束景南 余全介

冯友兰曾把中国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的时代称为经学 时代。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朱熹作 为中国封建社会继孔子之后影响最为巨大的儒家代表人 物之一,其实他首先是一个经学家,其著作也主要是经 学著作,研究其理学或者其他思想本来都应该建立在对 他经学研究的基础上。然而, 历来人们都主要把他作一 个理学家来研究,集中研究朱熹的理学思想,而对朱熹 经学思想的研究几乎留下大片空白。与朱子学的其它分 支相比,朱熹经学的研究显得相当滞后,一般在现代学 者的专经通史、断代的经学史及较少的几部经学通史中 有相关的章节对朱熹经学进行了简要的研究。这些研究 固然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对朱熹经 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发掘: 专经通史只是关注朱熹经学 的某一个方面, 其中研究较多的就是朱熹的《诗经》 学:《尚书》的通史当然只着重蔡沈的《书集传》,至于 朱熹的《易》学、《春秋》学和《礼》学则是少有论及。 此种情形下、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 656 页, 49 万字。以下皆 简称为蔡著)的出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 部全面系统研究朱熹的经学思想的专著,是对朱熹思想 研究的新突破新开拓, 填补了朱子学与经学(宋学)研 究的空白。

蔡著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面四章为第一部分,是 对中国经学史的宏观研究,为后面对朱熹经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的背景和历史参照。第五章至第十一章为 第二部分,把朱熹经学分为具体的各个门类进行剖析, 这是全书的重点和主体。第十二章至书末,在分门别类 对朱熹经学进行研究之后,对朱熹经学的特点、经典诠 释学、地位和影响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可以说,蔡著第一次深人地对朱熹的经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深刻揭示了朱熹经学的思想的特点,揭示了朱熹的经典诠释学,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超越了前人。

一、宏阔的经学文化视野:点、面、线三结合的研 究方法

《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研究朱熹经学的最大特色, 首先就是它的宏阔的经学文化视野、作者采取了点、面、 线三结合的研究方法,这实际就是一种宏观探讨与微观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关于此书的研究的方法、作者有这 样一段说明: "鉴于朱熹经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的 产物、是经学中宋学的重要理论代表,所以应结合中国 经学思想发展史、宋学思潮来研究朱熹的经学思想,把 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朱熹经学为 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 面、线三者结合, 在相互联系中, 作纵横比较, 全面、 系统、深入地去研究朱熹经学的理论构成、特征及其在 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防止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脱离宋学和整个中国经学的演变发展去孤立地研究朱熹 经学。"蔡先生对"点、面、线三者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的阐述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以中国经学史和宋学作 为朱熹诸经学的思想背景,尽可能地为对朱熹经学的研 究创造--个网络, 使得站在朱熹经学的任何--个点上都 可以追溯其渊源和发展历程;都可以通过对以后的影响 来评价其意义和贡献:都可以对朱熹经学作出既客观又 恰当的定位。

蔡著对朱熹经学研究的超越前人的新突破与深人,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研究方法的正确的选择。何**耿**

[[]作者简介] 東景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8。 余全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博士生,浙江 杭州 310028。

镛先生在《经学概说》中对专门研究经学家的著作作出了 这样的评价:"这类著作作为后代记载,不能看出经学发 展的趋势,且偏重于个人的成就,而看不出某一时期总的 情况。"陈居渊在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的"出 版说明"里面也表达同样的见解。可见对经学家进行研 究不大容易揭示一个时期的经学大势和特色。为了避免 此种情况,蔡著在以朱熹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注意揭示了 他经学思想所处的宋学背景和整个经学思想在历史长河 中的演变流转,深入地探讨了朱熹思想的渊源、对前人思 想的发展、对自己思想的修正和调整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综合了专经通史、专经断代史、经学 通史以及个人经学思想研究的长处和优点。例如,蔡著在 论述朱熹《诗经》学的时候,就讲到朱熹《诗》学的宋学背 景;讲到宋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兴起的原因和历程。宋代欧 阳修、苏辙、郑樵等人对朱熹《诗》学的影响更是第七章的 重点。朱熹关于《诗经》一系列经学思想提出的背景提出 的价值以及对经学研究的影响都在后面的章节里——提 到。其中理会赋比兴一节,更是把朱熹之说与东汉郑玄郑 众、唐代孔颖达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考查了他们在理 解上的异同。对这种理解异同背后的治经理念也进行思 考和推究,而这种治经理念往往关涉时代的经学思潮。这 样一来,就容易使读者对《诗经》研究的经学史脉络有一 个大概的了解;对宋代《诗经》学的兴起、思想内容、特色 和影响都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对宋学勇于怀疑、破除陈见 的总体风貌也有了一个具体而实在的把握。对朱熹经学 进行的这种点、线、面相结合的研究,克服了传统以经学家 为研究中心所必然具有的缺陷,它超越了仅仅罗列经学家 著作的形态,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这种融合专经通史、 专经断代史和经学通史的研究方法,使人对研究对象所处 的时代的经学思潮有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印象,从而, 对于准确把握朱熹的经学思想有极大的帮助。

蔡著把朱熹的经学思想放到整个经学史和宋学思潮的发展中,对朱熹经学的七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了具体详尽的个案研究,然后,把个案研究所得的结论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总结出朱熹经学思想总的本质层次的特征。这里不妨以蔡著在朱熹《礼》学思想研究上的开拓创新为例:

相比朱熹经学的其他组成部分,朱熹《礼》学思想的研究显得更加薄弱。周予同先生《朱熹的经学》里面对朱熹《礼》学思想做了初步的研究,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三礼的历史;第二,朱熹《礼》学的古文家立场;第三,朱熹对三礼关系论述的论定。周予同先生认为:"朱熹于《诗》不信毛郑,于书置疑《古文尚书》,如按以两汉家法,则当排斥《周官》,尊信《仪礼》;然经学上之宋学,自有其主观上之立场,而非家法之所能限。故朱熹之于三礼,以《周礼》为周制,《仪礼》为未备,而于《礼记》加以贬抑。"又认为"此种以《仪礼》为未备而惋惜《逸礼》亡佚之

语调,实俨然古文家言也"。周先生把朱熹《礼》学思想归 为经古文学家一类,认为"故以经学言,朱熹多因袭之论, 而以礼制言,则朱熹亦自有其创见也",虽然肯定朱熹制 礼的努力,但是从主体上否定了朱熹的《礼》学思想作为 经学思想的学术价值。蔡著在全面研究朱熹经学的过程 中,发现强调经传相分可以说是朱熹经学一以贯之的特 点:在对《大学》研究时,朱熹把"四书"之首的《大学》分为 经一章传十章的经传两个部分,以提出和解释三纲领八条 目的内在逻辑,把《大学》分为经和传的两个部分;对待 《周易》,朱熹把《周易》分为上下经与十翼经传两个部分, 在他的《周易本义》里,他把十翼从基本的经文中分离出 来,列于上下经之后,体现了经传相分的原则:在《诗经》 方面,朱熹提出《毛传》"不与经连"的经传相分的思想;对 待《孝经》,朱熹同意《孝经》是孔子自著的观点,把《孝经》 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经文部分是《孝经》的前六章,朱熹 将其合为一章,作为经文,认为经文是曾子门人记孔子曾 子问答之言,其传文部分为经文以下的内容,朱熹把传分 为十四章,不与经文混合在一起。同样,朱熹的《礼》学思 想也具有经传相分的特点,蔡著认为朱熹以《仪礼》为经, 《礼记》为传的思想,是对宋学中王安石新学一派的批评。 亦是其经传相分、不以传废经思想的表现。

了解这个总特点,给蔡著分析朱熹(礼)学思想提供 了背景知识的支持:基于朱熹在研究其他经书也大都强调 经传相分的特点,所以《礼》学中的经传相分相合就不是 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体现了朱熹一贯的治经风格 和特点,经传相分是朱熹《礼》的根本观点。这一认识表 现了对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逐步深化,是在发现朱熹经学 总特点之后对它的具体组成部分再次进行的深层次的研 究。蔡著认为:"朱熹提出经传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为 了克服只讲传注,不重经义,或只重阐发传文之义理,而脱 离经文之本义的偏向。从而把经文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以作为经学的基础,强调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道理 应从经文本义中得出,或通过以义理解经来探求,但反对 以推说义解经,以就己说。这正是朱熹唯本义是求解经原 则的充分体现"。蔡著由此敏锐地察觉了朱熹经传相分 总特点在《易》学和《礼》学中具体运用时的细微而重要的 差别:同是经传相分的特点,"其《礼》学的侧重点在于经 传相合。朱熹易学经传相分,复古(易)之旧的目的,乃于 说明《周易》的《经》这部分本为卜筮而作,不应将《传》对 义理的发挥与《经》的卜筮混为一谈。而朱熹《礼》学的经 传相合,则是为了便于学者理解《仪礼》经文的本义。虽 然是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而发,目的都是为了强调和突出 经文本义的重要性,其易学是为了强调《易经》的本义是 卜筮,而其《礼》学则是为了方便学者了解《仪礼》经文的 本义为何"。虽然经传相分与相合,都是为了直求经文之 本义,都是以经为主,而以传为末,传注等材料是为了解释 说明经义的。但是,揭示经传相分这一总特点在运用上的 具体差别,表现了蔡著对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细 化。对细节执着的钻研又为充实朱熹经学总特点的研究 提供了更感性的实证的支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蔡 著研究模式上的优势。这里不妨再看一下周先生在这个 问题上的说法和蔡著的纠偏:

周先生把朱熹《礼》学中经传相分的思想与朱熹推重 《周礼》联系在一起,得出朱熹重视信赖《周礼》的结论,并 进而推定朱熹经古文学家的立场。实际上,经学相分和相 合作为朱熹治经一贯的特点,这个特点具体到《礼》学的 运用虽然有自己的侧重点,但是都是为了重视经义本身, 也就是说为了强调《仪礼》作为经义载体的重要地位,而 不是出于古文家的立场对《周礼》进行推重,并不能以此 作为朱熹的古文家立场的一个证据。其实,朱熹对《周 礼》的推重也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蔡著在"因与时"一节对 此进行了客观又实事求是的分析:"朱熹以《周礼》为纲 领,既强调'礼,时为大,'变革其流弊,随时变通,以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主张因与时相结合,不以其流弊而否 定《周礼》,对于三纲五常等礼之大本大原,则须护持而不 可变。在维护纲常不变的前提下,又主张贯彻简易疏通, 易知易晓的原则,目的是为了以礼来治国立教,体现了儒 家礼治的精神,亦是朱熹治经为现实服务思想的体现。" 因与时都不应该脱离对方而存在,对立又统一,这种看法 更合理也更加符合朱熹经学的实际。其实,朱熹经学思想 中因时结合法也体现在他对《大学》的研究中,蔡著所以 从朱熹《礼》学思想中挖掘出"因与时"的观点,与它对朱 熹《四书》学中《大学》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简言之,点、面、线三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蔡著可以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便于得出全面合理的总的结论和评价,这种高屋建瓴的结论和评价与蔡著对朱熹经学某一具体门类经学的深刻挖掘和研究相辅相成,全面关注与深刻挖掘互相依靠、互相促进。从而使得蔡著在朱熹经学研究的很多重要问题的看法都超越了前人,把朱熹经学思想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准确的派别定位:汉学与宋学的集大成者

经学的派别是经学通史、专经通史以及经学断代史都必须涉及的问题,对经学派别的不同观点往往可以影响对具体经学家的研究:首先它影响对研究对象的定位;其次,因为定位不同它又影响对经学家成就和在经学史上贡献的评价。蔡著把朱熹定位为汉学与宋学的集大成者,认为他超越了传统经学派别的对立,是经学史上一个融通汉宋学诸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这一定位是十分准确的,是我们全面正确认识朱熹经学思想的基础。历来一般把朱熹简单归为义理经学派,或笼统归为宋学的代表。蔡著认为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兼取汉、宋,融会义理与训诂之学"。以此为指导,蔡著从朱熹经学的各个方面都具体

揭示出了朱熹经学融贯汉宋学的特征。蔡著深刻揭示出朱熹经学的三大特征:"经传相分,直求经文本义;以四书学为基础,以义理解经;重训诂辩伪,"实际也恰好精辟概括出了朱熹经学的融贯汉学与宋学的特点。

这种定位不光是一个划分经学派别的问题,它实际上 就影响了对朱熹经学的准确分析和研究,即使在具体某一 门经学的研究上也受到此种定位的影响。蔡著在全书第 二部分对朱熹经学进行分门别类的专经研究时,也非常重 视朱熹作为汉宋学集大成者所具有的特点。例如在朱熹 《易》学上,周予同先生认为朱熹易学与程颐易学相对立 而存在,分属宋《易》里面的象数、义理二派。"程、朱之 《易》学,虽均属与汉易对峙之宋《易》;然程为宋《易》中之 义理派,而朱则为宋《易》中之象数派,二人之立场固自不 同"。周著进一步论述了其中的缘由:"朱熹之《易》,喜言 太极无极,先天后天,其继承陈抟、邵雍象数之学,无可讳 言。在朱熹之本意,或以为程颐《易传》偏于义理,故济之 以象数,以维持其哲学上之调和统一的态度;殊不知学术 上有绝不能调和统一者,于是程、朱之《易》学陷于敌派之 嫌,此实非朱熹初意所及料也。"蔡著在这个问题上却认 为朱熹对程颐和邵雍的易学都有扬弃和吸取,并不是最终 站在了象数的立场。因为朱熹重视象数,重视义理来源的 同时,又强调不能脱离象数和图书来谈义理,要从象数过 渡到义理,象数就像朱熹眼中的古文经学家的训诂考据, 它最终必须走向义理,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纯粹考据和训 古的层次。也就是说要全面把握朱熹(易)既重视象数图 书的一面,也应该注意到他重视义理以象数卜筮求义理的 一面。蔡著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认识与其对朱熹在经学 派别上的定位有着紧密的关联。"朱熹以义理思想为指 导,重本义,重象数,将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把宋 易之义理派与象数派包括图书学统一起来的易学思想的 提出,是对中国易学史上先前思想资料的吸取、借鉴、继 承、扬弃和发展,亦是对宋代易学的总结和发展,而集其大 成。在这个过程中,程颐的义理学和邵雍的象数易学等均 对朱熹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看法是十分精辟 的。根据蔡著,我们可以知道:图书是象数的来源,故朱熹 借鉴邵雍等人的图书之说,以图解《易》。又以象数、卜筮 求易理,认为象数以自然法象、阴阳之理为存在的根据,通 过象数来推其蕴涵的理,并以占卜之辞作为即象推理的中 介,义理的推说经历了由象数到卜筮之辞,再到义理的过 程,这与程颐(易)说有所区别;朱熹提出理、象、数、辞未 尝相离的思想,既肯定《易》的占筮本义,又不停留于此, 而是主张于象数、占筮中发挥出义理来,强调义理建立在 卜筮之辞的基础上,不得与象数相脱离,分别吸取了邵雍 的象数易学和程颐的义理易学,并把两派综合起来加以发 展,从而集宋代易学之大成。因此,尽管朱熹的《周易本 义》不仅在版本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差异,

也不该把朱熹简单的视为程颐(易)学的对立面,朱熹的立场应该是以象数、卜筮求义理,统一义理与象数两派,统一了汉(易)学与宋(易)学。

事实上,通过蔡著,我们可以知道:朱熹经学对起始于 西汉时期的经学今古文两大对立学派进行了又一次重要 的总结。一方面,朱熹经学对今文学派离开训诂小学专谈 义理进行了纠偏;另一方面,古文经学搦于琐细考据,忘记 "道统"而不求"义理"的做法在朱熹那里也得到了改正。 蔡著虽然在分析经学派别根据朝代列为三节众多类型,然 而,在后面分章对朱熹经学作分别的研究时,却往往不离 这两个基点。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第一,在整个宋学给人 以"空疏"的印象之后,置重点在朱熹对经学训诂的重视 以及他对经书传注的造诣上面,无疑给人以朱熹融贯汉学 的印象。第二,今天对宋学的评价日趋客观合理,不会完 全站在乾嘉学派的立场对宋学发展经学义理持否定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挖掘朱熹经学研究中对义理的重视和着 重,无疑使朱熹经学随宋学的被肯定而一起受到应有的尊 重。第三,因为它可以既强调朱熹对今文学派的发挥,又 可以突出它站在宋学立场上对汉学训诂考据传统的继承 和发挥,这样就加深了朱熹作为一个融通汉宋学术的经学 总结者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正是因为蔡著在评论朱熹经学时,充分注意到了朱熹 其对经今古文学派的全面吸收和借鉴,所以在第十二章论 朱熹经学的特征时,第二节以"以"四书"学为基础,以义 理解经"为标题;紧接着第三节就把"重训诂辩伪"作为题 目。其实,对朱熹经学的这种定位在第四章论述朱熹经学 思想渊源时就已经提到了。蔡著认为"汉唐训诂之学"也 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的渊源:"朱熹在治经学的过程 中,明显受到以上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一定影响。他吸取 其优长,批评其流弊,并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将训诂注疏之 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经 注材料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克服了宋学的流弊。这是他 高出同时代理学家之处。溯其源,与他一定程度地接受了 汉唐训诂之学的治学方法有关。"由此可见,蔡著对朱熹 作为汉宋学的集大成者的论述实际上以另一个观点为其 背景:那就是朱熹总结了整个自汉至宋的经学历史。当然 也可以这样表述:朱熹全面继承自汉以来的经学今古文学 派的优点并以此为基点对汉宋学进行了总结性和集大成 性的研究。这种观点与朱熹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是很 能吻合的。

三、诠释学的文化视角:经学与理学的贯通

朱熹的经学思想体系实际是一个经典诠释学体系,他的经学是通过诠释儒家经典的形式对中国传统经学"原

典"加以思想理论的创造,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学的经典 诠释学。朱熹正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把他的经学与理学贯 通融会起来。所以在他那里,经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 前人在研究朱熹的经学时,都没有注意到朱熹的经典诠释 学体系。蔡著研究朱熹经学的新突破新开拓,又集中表现 在对朱熹的经典诠释学的深人研究上。这是对朱喜经学 更深层次的发掘。蔡先生自己认为:"本书从研究朱熹经 学与中国经学的相互关系出发,在全面、深入探讨朱熹丰 富的经学思想的基础上,以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大量诠释 及其诠释方法论为依据,从中概括提炼出朱熹的经典诠释 学,以为创建中国的诠释学作出一些努力和探索。"对朱 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是《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研究朱 熹经学最具特色和最具开拓创新的方面。蔡著精密分析 了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认为朱熹不仅从认识论上提出了一 系列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而且建构起了本体论论 释学。朱熹把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结合起来,他以经典原 文和原义为经典诠释的依据,以义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 典,提出了独特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包括训诂与义理相结 合法、历史还原法、因时结合法、古为今用法、直阐本义法 等,其中尤以训诂与义理结合法最具方法论上的指导意 义。在这种经典诠释方法论下,朱熹又提出了具体的经典 释读法:包括虚心切己法、熟读精思与多读书结合法、反复 紬绎法、阙疑法等。 蔡著的这些分析是十分精辟独到的, 它第一次揭示了朱熹的经典诠释学的秘密。可以说蔡著 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是对朱熹经学思想研究的新的 提升和深化,使我们可以透过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进一步看 到朱熹经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他的经学与理学的贯通、他 的独特的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实际上,中 国古代的经学都有自己的经典诠释学:汉学有汉学的经典 诠释学,宋学有宋学的经典诠释学,清代经学(朴学)有清 代经学的经典诠释学。因此研究经学,必须高起点研究它 的经典诠释学,而我们历来研究经学恰恰都离开了它的经 典诠释学。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在经 学研究上开创了研究经学的经典诠释学的新路,意义十分 重大。

蔡先生对中国文化和朱子学都深有研究,这次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来研究朱熹经学思想及其与中国经学的关系,在他本人是厚积薄发,开创了研究朱熹思想的新境界。蔡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是当今朱子学研究和经学研究深化的标志,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朱子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动经学文化的研究。

(责任编辑 张 斌)